

杨福泉

著

纳西族文化史论



作者将自己长年从事纳西学田野调查所得和国内外民族志资料融会一体，全面论述了纳西族的多元文化的

《纳西族文化史论》的发展脉络，其中包括对后来传入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

教、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的论述。同时，全书对纳西族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纳西族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哲学观念、纳西族

的分析阐述。作者还对清代“改土归流”后

以丽江古城为例，论述了历史上外来文化和纳

西族本土文化的整合，以及不同民族在纳西族地区的融合。

的田野调查所得和国内外民族志资料融会一体，全面论述了纳西族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脉络，

其中包括对纳西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个性特点和纳西人民族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东巴文化，以及后来传入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的论

述。同时，全书对纳西族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纳西族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哲学观念、纳西族的汉学教育等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对它们的性质、

特征、历史变迁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作者还对清代“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文化和儒家礼教传入纳西族中后导致的重大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

以丽江古城为例，论述了历史上外来文化和纳西族本土文化的整合，以及不同民族在纳西族地区的融合。

《纳西族文化史论》的作者将自己长年从事纳西学的田野调查所得和国内外民族志资料融会一体，全面论述了纳西族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包括对纳西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个性特点和纳西人民族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东巴文化，以及后来传入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的论述。同时，全书对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纳西族



文化史论

杨福泉

著

《纳西族文化史论》的作者将自己长年从事纳西学的田野调查所得和国内外民族志资料融会一体，对纳西族多元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包括对纳西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个性和纳西人民族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以及后来传入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的论述。同时，全书对纳西族文学艺术的历史流变、纳西族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哲学观念、纳西族的汉学教育等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对它们的性质、特征、流变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作者还对清代“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文化和儒家礼教传入纳西族中后导致的重要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以丽江古城为例，论述了历史上外来文化和纳西族本土文化的整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地区融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西族文化史论/杨福泉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1112-157-3

I. 纳... II. 杨...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文化史
IV. K2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4808 号

纳西族文化史论

杨福泉 著

责任编辑: 冯 峨 蔡红华

装帧设计: 刘 雨

责任校对: 段建堂 杨文辉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1

字 数: 52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57-3/C·114

定 价: 56.00 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杨福泉：男，1955年9月生，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古城人。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云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通志馆馆长、《华夏人文地理》杂志社总编。被评选为云南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入选“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曾应邀赴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士、瑞典、埃及、泰国等国讲学访问，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过博士后研究。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130多篇论文。个人主要专著有：《现代纳西文稿翻译和语法分析》、《神奇的殉情》、《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灶与灶神》、《纳西文明》、《原始生命神与生命观》、《秘笈古韵》、《走进图画象形文的灵境》等18部，其中多部专著多次重印和再版，有的被译成英文。学术研究之余，致力于散文创作，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数十篇，出版了《寻找祖先的灵魂》、《神奇的东方大峡谷——虎跳峡》、《纳西人的圣山与情山——玉龙山》、《殉情》、《走进纳西人的心灵和家园》、《古王国的望族后裔》等文化散文长卷。

纳西族
文化史论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内容简介

《纳西族文化史论》的作者将自己长年从事纳西学的田野调查所得和国内外民族志资料融会一体，全面论述了纳西族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包括对纳西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个性特点和纳西人民族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东巴文化，以及后来传入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的论述。同时，全书对纳西族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纳西族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一些哲学观念、纳西族的汉学教育等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对它们的性质、特征、历史变迁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作者还对清代“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文化和儒家礼教传入纳西族中后导致的重大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以丽江古城为例，论述了历史上外来文化和纳西族本土文化的整合，以及不同民族在纳西族地区的融合。

目 录

导 论	(1)
1 纳西族社会与历史概述	(18)
1.1 纳西族社会概述	(18)
1.2 旧石器、新石器文化的考古发现	(34)
1.3 从石棺葬考古发现看纳西族的历史	(37)
1.4 从古文献看纳西族的历史渊源	(43)
2 纳西东巴教文化发展史论	(49)
2.1 东巴教概述	(49)
2.2 图画象形文和东巴经籍	(65)
2.3 东巴文化中的古羌文化溯源	(79)
2.4 东巴文化中的巫文化溯源	(100)
2.5 历史上本教对东巴文化的影响	(114)
2.6 东巴教与本教之比较研究	(122)
2.7 敦煌吐蕃文书与东巴经比较研究一例	(142)
3 纳西社会的佛教、道教文化史论	(156)
3.1 藏传佛教文化发展史论	(156)
3.2 汉传佛教文化发展史论	(213)
3.3 道教文化发展史论	(225)
3.4 释、道及东巴教的整合	(234)
4 纳西族的汉文化史论	(243)
4.1 元明时期汉学的传入和发展	(243)

4.2	清代汉学的发展及清末的汉学教育改革	(253)
4.3	民国期间汉学的发展	(266)
5	纳西族艺术史论	(272)
5.1	本土文学的发展	(272)
5.2	绘画和书法的发展	(300)
5.3	歌舞与音乐的发展	(333)
6	清代“改土归流”与纳西族的文化变迁	(362)
6.1	“改土归流”中的“以夏变夷”对纳西族传统 文化的冲击与“以夏变夷”	(362)
6.2	文化冲突导致的殉情悲剧	(369)
7	纳西族哲学思想史个案研究	(395)
7.1	生命三阶段论	(396)
7.2	灵魂观	(410)
7.3	“气”与生命观	(420)
7.4	“青蛙五行”与生命观	(426)
7.5	生死观	(437)
7.6	生态观	(455)
8	从丽江古城看历史上的纳汉文化交融	(464)
8.1	引言	(464)
8.2	汉文化对丽江古城的影响	(465)
8.3	纳、汉文化在丽江古城的交融	(470)
8.4	本章结论	(475)
	主要参考文献	(477)

导 论

从语言文字上分析，汉文今天通用的“文化”二字，是近代学人在译介西方相关语汇（如拉丁文“cultura”）时，借用中国汉文化中固有的“文”、“化”以及“文化”等词汇，加以熔铸再创而成的。“文化”的西方对应词——拉丁文“cultura”，其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等多重意义，蕴涵着通过人的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16、17世纪，英文和法文的“Culture”（德文对应词为“Kultur”）逐渐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并进而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可见，与中国古代“文化”概念一开始就有“文治教化”的含义相异趣，欧洲的“Culture”一词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引向精神生产活动的。^①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下了一个著名的文化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②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个性，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该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积累形成的。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要素。如美国学者F. 普洛格所说：“文化是一种适应方式”。美国历史学家B. M. 费根对文化的理解是：“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环境的重要手段。”^③

①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国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② E. B. Tylor, *The Origins of Culture*,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8, P. 1.

③ 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4页。

在纳西族的语言中，没有与上述中外语言文字相应的“文化”一词，近年来，老东巴和纳西族的学者们常常把“文化”翻成“窝增”（wo zzei）和“本里书母”（bee lee shu muq），“本里书母”一词在东巴经典中的原意是指谷物和麦子，引申意为“遗产”，指祖先留下来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遗产，也是由最初的指实物进而包括了精神性的遗产。“本里书母”指“出处来历”，“本”原意指蒿，在纳西人的自然观中，认为蒿是最早出现的植物，故视之为神圣之物；“书母”指铸铁的模型，“本里书母”通指人间万事万物最早的出处来历，因此也引用来指知识和文化，如东巴经典中有句话：“本里木牢固优谋，精崇汝本所索得”（bee lee mul me¹gv¹l yeme, jji coq ssee bbei sosoq ddee），意思是：“知识是永远不会死亡（消逝）的，人们应该学一辈子。”

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的《纳西象形文字谱》中这样解说“本里书母”：“来历也，从模范‘本’（bee，蒿）声，铜范为金属工具之始。”“都母”则解为“规矩”。^①李霖灿先生在他的东巴经翻译中则把“本里书母”大都翻译成“原由规模”。

“都母”（du muq）直译意为“都神所创造的模式”。此词是纳西族伦理道德思想中的一个观念，称为“都”。凡是符合本族社会规范、习俗、传统习惯法等的行为，纳西人均称之为“都”，意思与汉语中的“兴”（做某事）相近，否则称为“某都”，即“不兴”（做），如过去在纳西族社会中，姑舅表婚是“都”的，而同一宗族内通婚是“某都”的。千百年来，纳西人的社会行为都以这“都”和“某都”为基准而进行。这个“都”的观念源于东巴教，“都”原是东巴教中的一个重要神祇，又叫美利督阿普，简称时则由“督”变音调而发音为“都”^②。他的配偶叫次抓吉姆，又称为“色”。雌雄二元对应是东巴教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特征，“督”与“色”类似于汉文化中的阴与阳。督神创造了世上万物，并给了世上万物不同的寿岁。东巴教认为每个仪式程序也是督神规定下来的，因此，东巴教的每个仪式都有一本指导性的“仪式

^① 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398页。

^② 在很多东巴经译文中，“都”或“美利督主”被译为“董”或“美利董主”，其实纳西语发音更接近于“都”或“美利督朱”。

规程经”，称为“都母”，意为督神规定的规程。每个仪式都必须严格按照“都母”来进行。到后来，“都母”这个词就成为一个固定术语，指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来历和准则，因此也被引申来指称“文化”。

纳西族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三省区毗邻的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支流无量河和雅砻江流域，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云贵高原。境内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虎跳峡、玉龙雪山、哈巴雪山、梅里雪山、白芒雪山、贡嘎岭等名山大川。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2年）的统计数，纳西族人口共308 839人，其中云南省有295 464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纳西族人口为201 066人。^①从人口数看，纳西族在中国各民族中只能算是一个小民族，但它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却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举世瞩目，因此，纳西族素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如著名学者任乃强在所著《西康图经·民俗篇》中论及滇边诸族曰：“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②著名学者吴泽霖亦说：“在我国各种边民中，无论在集体成就或个人造就上，麽些族实在是首屈一指的。”^③

这个人数不多的山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了古文明的辉煌乐章。从纳西族的文化发展史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格局和内涵。如果简述它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叙述。

一是从考古中发现，如今纳西族聚居地的文化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包括约十万年前“智人”阶段的“丽江人”时期的古文明。我们不能断然说这些考古发现是纳西族先民创造的，但也不能排除它们与纳西先民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密切关系，因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形成总是存在着迁徙而来的移民与当地土著相融合的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它们作为纳西族文化史发轫的早期文明背景来叙述。

1956年，在丽江市漾弓江木家桥发现了三根人类股骨化石；1964

① 丽江地区已经于2002年12月26日撤地改市，所辖县区包括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原来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分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

② 转引自方国瑜《麽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

③ 吴泽霖：《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载《边政公论》，1949年第5卷第2期。

年，在此地又发现了一个人头骨，考古学界将其定义为“丽江人”。经测定，丽江人属于人类发展史上的“智人”阶段，距今约5~10万年。1980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先后在丽江金沙江沿岸的石鼓、巨甸、热水塘、老八课，永胜县马家河，宁蒗县金锡、永宁乡开基村，盐源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物。这说明在如今纳西族聚居的地方，早就有人类居住并创造了早期文明。

纳西族文化发展史上又一重要的内容是从新石器文化过渡到金属时代的文化，特别是青铜器时期的文明，它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石棺葬文化中。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南地区从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起，西至西藏昌都一带，沿横断山区发现了一批连成片的石棺葬。其时代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为止。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古氏羌人。而在今丽江格子、大具、红岩、马鞍山，德钦县纳古，“康南”（今四川甘孜州南部和凉山州北部）等纳西族的聚居地，石棺葬的发现相当普遍，它与纳西族的历史渊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①

此外，最近十年来陆续发现位于丽江县（如今的玉龙县和古城区）、中甸县金沙江沿岸纳西族聚居区域的一批古代崖画，仅在丽江县境内的金沙江边就发现了十二个崖画点，学术文化界将其称为“金沙江崖画群”。这些崖画反映的内容与经济、信仰、生活中人与兽的关系以及狩猎习俗密切相关，它是探究纳西族聚居区人类古文明印迹的重要资料。

纳西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每一个时期都产生了与该时期时代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文化。如果择其要者而论，则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纳西族精神文化史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纳西人和纳西族社会以及纳西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因此，本书将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叙述纳西族的文化发展：

一个是作为纳西族本土文化的主干部分——基于纳西族本土宗教东巴教而形成的东巴文化；再一个是主要自明代以来传入的汉文化，包括

^① 关于石棺葬，可参看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第一章“纳藏两族同源异流考”中的第一节“滇川藏地区的石棺葬与两族源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汉传佛教、道教及儒家文化；再一个就是主要在明清时期传入和发展的藏传佛教文化。这几个方面的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和纳西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此外，纳西族本土的哲学思想发展轨迹和纳西族的民间艺术发展轨迹，也是本书要探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们奠定了纳西人的宇宙观、生命观、生死观、生态观和人生的审美情致境界，对纳西族民族精神、个性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本书还将重点论述发生在1723年“改土归流”之后的纳西族社会和文化变迁，因为这一来自清廷中央王朝的政治变革是纳西族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它为界，纳西族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很多本质的变迁，它与纳西族文化多元性特点的形成、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等有很大的关系。

纳西族古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古老的纳西族原始宗教^①——东巴教，它最初产生于纳西先民的“泛灵信仰”（Animism）和古老的巫术文化（Shamanism，又译为“萨满”或“巫教”），是纳西族古代氏族制社会的伴生物。纳西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有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经历了氏族——部落集团为基本单位的原始社会^②，早期的东巴教充分反映了纳西族在这一社会时期的各种社会意识和文化形式，以及纳西人把支配人们生活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超自然化而形成宗教崇拜对象的思想轨迹，如基于灵魂观念的“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识。

东巴文化是本民族社会生活、宗教哲学、历史演变、民俗事象、科技医学、文学艺术等的百科全书；东巴教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与其他民族广泛的文化交往，不断地广纳百川之流，吸收了早期本教、藏传佛教、道教乃至辗转从各种渠道传来的古波斯、古印度文化等因素，最后形成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页奇观。东巴文化融会的多元文化内容宏富博大，因此，被国际上很多学

^① “原始宗教”在国外又有 Indigenous Religion，即“本土宗教”、“土著宗教”、“原住民宗教”等称谓，最近有的学者又将“原始宗教”定义为“原生性宗教”。笔者考虑到中文的“原始”一词与英文的“Primitive”不尽相同，有原初、最初、初始等意思，因此在此根据纳西族东巴教的性质、特征仍用“原始宗教”一词。

^② 关于原始宗教是“氏族—部落宗教”的观点和理论阐述，请参看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者视为解开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播、交流，以及原始宗教的发展演变、藏族佛教传入前古本教文化之谜等的一把神秘钥匙。

东巴教与流行于藏族地区和古羌人后裔各族群区域的本教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早期本教的形成情况是复杂的，它的雏形是产生于青藏高原诸多部族中的原始宗教，流行于西藏、青海等广大地区的不同民族中，后来在各个民族中有了不同的发展和变异。本教研究专家斯奈尔戈洛夫（D. L. Snellgrove）曾指出，吐蕃古代宗教在任何地方都未被以“本教”之名称呼过。“本”首先是指土著宗教巫师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但本教作为一种宗教体系则以另外一种意义出现在公元9世纪末至11世纪中叶之间。^①这说明藏族的本教最初很可能是一种与纳西、彝、哈尼、傣傣等属于藏缅语族民族的原始宗教（本土宗教）非常类似的民间信仰形式，即一种普遍存在于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又有很多相同因素的萨满教（又译为“巫教”）形态，直到后来才逐渐演变成其教义、教规和宗教思想等融进了更多外来文化因素的本教。因此，纳西族东巴教中的很多古文化因素应该说是与藏族古代宗教有同源关系的，它不仅只是受“本教”的影响。

西方纳西学专家洛克（J. F. Rock）博士曾根据著名本教专家霍夫曼（H. Hoffmann）和自己的研究提出这样的观点：“霍夫曼曾指出，本教经籍中说，本教经师在西藏以外的地区也很活跃。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在本教逐渐被放逐到相邻部落中去之前，这些部落（特别是羌人部落）的民众就已经信仰本教。作为羌人中一支的纳西族，在他们南迁到现在的居住地之前，他们可能已经是本教的信徒。”^②这里所指的各个羌人部落所信仰的“本教”，应该就是一种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的原始宗教形式，从藏、彝、纳西、哈尼、傣傣等诸多藏缅语族族群对各自祭司、巫师的称谓都与词根“本”（bon）有密切关系的现象来看，所谓本教信仰，其实就是一种同源异流的原始宗教信仰。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公元7世纪以来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向

① [法] 石泰安：《敦煌写本中的吐蕃巫教和本教》，《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J. F. Rock, *The Na - khi Naga Cult and Related Ceremonies*, Part 1, Roma Is. M. E. O. 1952.

中国西南的扩张，纳西族聚居的不少地方被置于吐蕃的势力范围之内，此时期具有吐蕃文化特点的本教对纳西族的宗教产生了影响。随着公元8世纪吐蕃上层统治集团的“扬佛灭本”，很多被流放的本教徒来到纳西族聚居地传教，这就逐渐形成了后期本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本教祖师东巴先饶（或译为敦巴辛饶、辛饶米沃、辛饶米保等）也就在此时期成为东巴教的祖师丁巴什罗（或译为东巴什罗、东巴世罗）。

纳西东巴教祭司东巴创造了一种介于原始图画文字和甲骨文等象形文字之间的“图画象形文字”，这些图画象形文字始于何时，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定论，有殷商之前说、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等。从文字形态看，纳西象形文是一种正从图画字向象形字过渡的文字，在文字发展史上代表一个特殊的阶段。

创制了这种图画象形文字的东巴用它书写了数万卷东巴教典籍，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东巴经”，这数万卷东巴经集纳西人传统智慧和哲思之大成，是纳西族本土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些散发着松香竹韵，烟渍斑斑的典籍中，凝聚着纳西先民对宇宙人生的冥想苦思、对天地人神鬼之秘及万事万物的起源等充满天籁之趣又不乏理性的解释、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睿智和理性的思考、对天文地理及生老病死的初步探索，记录了纳西人在漫漫岁月中的悲欢离合、世路沧桑。纳西人的古代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社会生活、民俗、医学、历法、动植物、生产知识、武器服饰等，在这万卷经籍中济济一堂，图画象形文字使纳西人的这些信仰、智慧和知识免去了湮没于幻化的时空、寂灭于多变的世路之命运。这些图画象形文古籍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一幅壮丽神秘的人文画卷。由于至今尚有纳西祭司“东巴”能读解这些象形文古籍，因此东巴文字被海内外誉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①亦如西方著名的纳西学研究者杰克逊（A. Jackson）博士的《纳西宗教》一书简介中所言：西方国家图书馆中所收藏的纳西族手写本是稀有独特的珍藏，因为它反映了一个部族的一整套宗教信仰。它们从

^① 参看西田龙雄《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的文化》，日本中公新书1966年版；洛克《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上卷，罗马东方学研究所1963年版；傅懋勋：《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载《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和志武：《试论纳西象形文字的特点》，载《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民族志的意义上来讲是稀有的，另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小社会（民族、族群）拥有这多达一万多卷的手写本古文献。^①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学者从未间断对它的研究，以至对它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②鉴于东巴教古籍的独特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15日将收藏在丽江的纳西东巴古籍文献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中。

纵观纳西族的文化发展史，除了主要基于本土宗教信仰的东巴文化之外，对纳西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汉文化和藏文化。迨至元代，在纳西族社会中传承的文化主体一直是东巴文化（包括纳西族东部方言区的达巴文化）和民间口传文化。到明代以后，以汉传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汉文化和主要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文化在纳西族社会中日益发展起来。

历史上，汉文化对纳西族的影响非常大，它是促进纳西族近现代文明，促进纳西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动力，同时，也是引发纳西族重大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儒学文化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最初可以回溯到元代。忽必烈于1253年平定大理后，在至元十年（1273年）派回回人赛典赤到云南主持政事。赛典赤到云南后，颇多改革，大力提倡儒学，至元十九年（1282年），“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元史·世祖本纪》）据史书记载：“董治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庠，所至庙宇圣像一新。”说明当时在丽江市设过学。元代文人王惠、王升父子先后到丽江倡导汉文化和儒学，但就学者一般是“官府子弟”，汉文化并未有长足发展。到明代以后，纳西族木氏土司推崇汉文化，历代土司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因此，在土司家族中产生了一些杰出的用汉文写作的诗人和散文家。但是，在元明两朝，汉学并未深入到纳西族民间。木氏土司在接受汉文化上实行的是一种独家垄断的政策，他们仿效一些中原汉人礼俗，但多是以据为己有的态度接受之，并没有将它普遍推行于民众中，因此，在木氏土司最盛时的明代，以儒学

① Anthony Jackson, *Na - khi Religion: An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Na - khi Ritual Texts*. Mouton Publishers, The Hague, Netherlands, 1979.

② 参看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载白庚胜、杨福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